



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其测量

——对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经验研究

胡涤非

摘要: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受到学界的关注日益增多,但在社会资本的结构和测量等问题上还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来源于广东省惠州市 P 村的调研资料的分析,发现 P 村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良好;社会资本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关联,其中,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呈微弱正相关,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都与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农村;社会资本;结构;测量;帕特南

一、相关文献回顾

罗伯特·D. 帕特南在对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绩效的对比研究中运用了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开启了政治学领域社会资本分析范畴的先河。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①正是帕特南开创性地研究了信任、网络和规范这些有利于促成集体行动的因素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接受社会资本内在维度的三分法,并且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的总体情况可以反映社会资本总量^②。

但是,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则存在诸多争议,其焦点主要集中于测量社会资本时应该选取的指标。国外学者如托马斯·福特·布朗和乔纳森·H. 特纳等把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归纳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三种。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关注的是个体自我通过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中观层次的分析则关注网络结构是怎样形成的,资源在网络中的分配,但它并不关注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关心的是形成、证明和展开社会资本的网络如何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的系统之中^③。在国内,微观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边燕杰的研究,他运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指标来测量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④。桂勇等在中观层面上测量了社会资本,他们以社区为研究单位,抽取了 50 个样本,构建了包括 7 个维度、29 个项目的测量指标体系^⑤。赵延东将社会资本分为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在宏观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上,他们建构了信任和公共参与两个测

①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195 页。

② 不同的学者在运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时各有侧重。有的学者侧重于从网络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展开理解,如边燕杰(2000)从企业的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赵延东(2002)通过对下岗工人的个人社会网络的调查研究社会资本在再就业中的作用。而李惠斌、杨雪冬等(2000)则从信任、互惠和参与网络几个方面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社会资本。

③ 参见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论与经验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④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⑤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载《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

量维度^①。

对社会资本研究领域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关于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与测量相对薄弱。胡荣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对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互惠、信任和规范等几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②。林聚任等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 5 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③。

二、研究目的与理论基础

通过文献检阅,我们发现研究社会资本的成果丰硕,但其中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相对薄弱,而研究社会资本各维度之间关系的就更少。我们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帕特南提出的社会资本的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为分析框架,在经验研究基础上探讨农村社会资本,进而反映乡村治理状态;二是对社会资本内在的三个维度——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

帕特南认为,“社会信任能够从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④。由此可见,帕特南将信任、规范和网络看成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三个重要维度,三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其中,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增加能够促进社会信任的增长。在三个要素中,帕特南似乎更看重信任维度的作用,他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⑤。经过研究,他发现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⑥。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帕特南详细阐述了互惠规范、参与网络和信任之间的关联。

第一,社会信任可以从互惠规范中产生。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互惠规范的存在,可以使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行动具有影响他人的后果(积极的或消极的)^⑦。当人们都意识到自己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后果的承受者时,规范产生了。社会规范与正式规范(法律、制度等)不同:前者是被灌输出来的,它更大程度上是由模式、社会化和社会惩罚等非正式强制手段来维系的。其中,互惠是规范中最为重要的一种^⑧。互惠规范之所以能促进社会信任,首先是因为他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社会合作。当行动者确信其付出会得到回报,而不是被人利用时,交换便会产生,不断重复的交换往往鼓励着普遍互惠规范的发展。在行动者的人际互动中传递着有关他人可信性的信息,这种传递不仅成本低,而且很可靠。其次,互惠规范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⑨。普遍的互惠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在行动中将短期利他与长期利己结合起来。某一行为在短期内可能只是利他的,但长期来看这些行为的集合将会使所有参与者受益。由此,互惠规范增加了社会的信任,进而不断提升社会资本总量。

第二,社会信任可以从公民参与网络中产生。任何社会都存在网络组织,这些网络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既可以是“横向的”,也可以是“垂直的”。帕特南认为,横向的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垂直的网络则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在垂直网络中,信息传递会失真,因为下级对上级总是有所保留的,这样的网络缺乏社会信任与合作^⑩。他指出:“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等,这些公民参与网络,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此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⑪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能促进社会信任是因为:首先,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因为欺骗使交易者面临双重风险:一是目前交易失败的

① 赵延东:《测量西部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1期。

② 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林聚任:《山东农村社会资本状况调查》,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④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1页。

⑤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199页。

⑥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0页。

⑦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0页。

⑧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1页。

⑨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1页。

⑩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5页。

⑪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5页。

风险,二是因为欺骗行为而产生的未来交易失败的风险。其次,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使关于个人品行的信息流通。因此,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最后,公民参与网络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社会参与越频繁,其社会信任度就越高。

三、研究资料与研究设计

(一) 研究资料

我们以对广东省惠州市P村所做的面访资料和问卷调查作为主要的分析资料来源^①。问卷和访谈选取农户为基本调查单位,调查涉及农户100户,人数198人,其中接受开放式深度访谈的有21人,有效问卷数为80份。我们以户为单位,将P村总户数按13个村民小组分群,给每组编号,从每个村民小组户数中随机抽取8户作为调查样本。考虑到P村村民文化水平不高,问卷是按访问问卷设计的,由访员登门访问填写,或者由家中具有初中学历以上的子女执笔代填。由于户主比较了解家庭各方面的情况,要求填答者是户主(P村户主多为男性),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大多数是户主、配偶及子女都在场,这正好弥补了户主对家中一些情况不了解或是不管事的缺憾。本研究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工作开展于2008年9月20日至10月17日,选择这一时间是因为P村村民此时正处于农闲和传统节日中秋、国庆等时节,打工或在外工作的人也回到家里,使得研究便于进行。问卷的填答、回收率为100%。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样本量和调查范围的限制,本研究的结论在进行推论时要十分谨慎,我们并不认为P村的调研情况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状况。

(二)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P村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和分析,并在经验数据基础上检验帕特南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内在的三个维度变量(信任、规范、参与)之间的关系。

1. 测量指标、问题选项及编码。我们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三个维度9个问题(表1)。三个维度分别是信任维度、互惠规范维度和参与维度。信任维度主要体现为本村村民之间的信任和对外来人员的信任(这里的外来人员主要指因经商、投资、承包农地等原因暂住本村的人);互惠维度主要体现为一种普遍的互惠,即村民的相互帮助是基于前文所言的普遍的互惠,体现为长时期内的互利互惠,这种互惠的实现是基于对他人的信任;参与维度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活动的参与(传统仪式、修建宗祠)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村委选举和修建公路)。最后,我们对问题的各个选项进行编码赋值(见表1)。

表1 P村社会资本测量指标

代码	问题	选项/编码
Q1	你认为村里人信得过吗	信得过(3),部分信得过(2),很少信得过(1),信不过(0)
Q2	你认为进入本村的外来人员信得过吗	信得过(3),部分信得过(2),很少信得过(1),信不过(0)
Q3	你从亲属那里得到的帮助	很多(3),一般(2),很少(1),没有(0)
Q4	你从村民那里得到的帮助	很多(3),一般(2),很少(1),没有(0)
Q5	帮助过你的人向你求助时你会	全力帮助(2),量力帮助(1),不帮助(0)
Q6	你参加村里传统仪式吗(如“上灯”、“拜祖”)	每次积极参加(2),偶尔参加(1),不参加(0)
Q7	你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吗	每次积极参加(2),偶尔参加(1),不参加(0)
Q8	你参与村里修路、饮水工程的情况	每次积极参加(2),偶尔参加(1),不参加(0)
Q9	你参与村里修建宗祠的情况	每次积极参加(2),偶尔参加(1),不参加(0)

^①在此感谢惠州市海洋渔业局魏远志先生不吝提供资料。

2. 信度检定。由于本研究是从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几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因此我们需要对三个维度的测量指标分别进行内在一致性检定(Cronbach's α 值),从表 2 可以发现其结果分别为 0.630、0.521、0.436,各标准信度系数均大于 0.4,说明本研究设计的三个维度指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见表 2)。

3. 效度检定。就帕特南的观点而言,他认为社会资本的信任、互惠和参与三个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并且在现代的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如果本研究构建的测量指标有效,那么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对社会信任变量具有解释力:当互惠规范维度得分越高时,信任维度得分也越高;同样,当参与网络得分越高时,信任维度得分也越高(见表 3)。

表 2 测量指标内在一致性检定表

测量指标	标准信度系数
信任存量	.630
Q1 你认为村里人信得过吗 Q2 你认为进入本村的外来人员信得过吗	
互惠规范指标	.521
Q3 你从亲属那里得到的帮助 Q4 你从村民那里得到的帮助 Q5 帮助过你的人向你求助时你的态度	
参与网络指标	.436
Q6 你参加村里传统仪式吗(如“上灯”、“拜祖”) Q7 你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吗 Q8 你参与村里修路、饮水工程的情况 Q9 你参与村里修建宗祠的情况	

表 3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N=80)

	互惠规范	参与网络	信任
互惠规范		.054	.289**
参与网络	.636		.443**
信任	.009	.000	

说明:1. 表中数字为相关系数。

2. 加黑数字表示显著相关。* * 表示 $p < 0.05$ 。

四、资料分析与讨论

(一) P 村信任维度情况分析

从表 4 关于 P 村信任维度整体分布趋势可以发现,村民对于本村村民的信任度很高,有 57.5% 的被访者认为本村村民都值得信任,超过 30% 的村民认为本村村民中有值得信任的,只有 2 位被访者(2.5%)回答对本村村民都不信任。同时,我们发现 P 村村民对进入本村的外来人员中有约 36.3% 的村民表示完全信任,有 40% 的村民表示其中部分人可以信任,而表示完全不能信任的受访者则有 6 位(7.5%)。

但当我们结合访谈资料来分析这些问卷数据时,却发现一种可能性:大部分 P 村村民虽然选择了信任他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明村民在情感上愿意相信村里人不会欺骗自己,在交往中都会遵守基本规范。但当涉及到具体利益时,村民的信任选择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如,当我们追问村民做生意愿意跟谁合作时,超过 80.6% 的村民愿意与比较亲近的“家人”、“宗亲”和“姻亲”合作,他们认为“与其他人合作以后会麻烦很多”。

表 4 信任得分的次数分布表(N=80)

	完全信不过	很少信得过	有些人信得过	信得过
你认为村里人信得过吗	2 2.5%	6 7.5%	26 32.5%	46 57.5%
你认为进入本村的外来人信得过吗	6 7.5%	13 16.3%	32 40.0%	29 36.3%

说明:每一栏中数字上一行表示次数,下一行表示占总数的百分比。

从表 4 我们似乎能感觉到村民对村里人和外来人员信任度上的差异,为了进一步检定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我们作了配对样本 T 检定。从检定结果看(表 5),村民对本村人的信任度的平均分为 2.45,高于对外来人员 2.05 的信任平均分,且经过统计上的检定我们得知,两者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与前文访谈中了解到的情况一致:村民对亲属、本村人、外村人的信任度是依次递减的。如村民对外来企业投资等社会资金的介入往往抱有很强的防卫感和拒绝感;村组签订土地租赁协议时更愿意与熟人介绍的企业签订,而不去和机会更多、但相对更为陌生、预期风险更大的外省人签订。

表 5 配对样本 T 检定(Paired-Samples T-Test)

	平均分	标准差	样本数	统计检定结果
对村里人的信任度(你认为村里人信得过吗)	2.45	0.745	(80)	t=4.133 df=79 p<0.001
对外村人的信任度(你认为进入本村的外来人员信得过吗)	2.05	0.913	(80)	
差异	0.40	0.866	(80)	

(二) P 村互惠规范情况分析

帕特南认为互惠是各种社会规范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它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互惠有两种,一种是“均衡的”(或“特殊的”),另一种是“普遍化的”(或“扩散性的”)①。均衡的互惠是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普遍化的互惠是指交换关系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具有持续性,这种互惠在特定的时间中是无报酬的或不均衡的,但从长期来看,参与者最终都能得到回馈。

我们的调查所涉及到的主要是普遍化的互惠,问卷中的“帮助”包括农忙期间相互帮助,经济周转不灵时的借贷等行为。从表 6 关于 P 村互惠规范维度整体分布趋势可以发现,有超过九成的村民从亲戚那里得到了较多和很多的帮助,只有两位被访者回答从未得到亲戚的帮助。关于从其他村民得到的帮助,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表示得到过帮助,但选择从未得到帮助的村民相对来说大幅增加,达到 13 个之多,占到有效问卷的 16.3%。关于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向自己求助时的态度,有九成五的村民选择了会给予回报。这说明 P 村的社会互惠规范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表 6 互惠规范得分分布表

	无	很少	较多	很多	平均分
亲戚的帮助	2 2.5%	3 3.8%	38 47.5%	37 46.3%	2.38
村民的帮助	13 16.3%	23 28.8%	36 45%	8 10%	1.49
	无	量力	全力		
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求助时的回馈	4 5%	37 46.8%	39 48.3%		1.44

说明:每一栏中数字上一行表示次数,下一行表示占总数的百分比。

(三) P 村参与网络情况分布

如前所述,社会的参与网络是复杂的,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横向的也有垂直的。横向的网络把

①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 201 页。

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垂直的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①。能有效促进信任增长的网络是横向网络。因此，我们在这里考查的主要是村民对于与自身利益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参与情况。

从表 7 关于 P 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整体趋势分布来看，在“参加传统仪式”选项上，有 62.5% 的村民每次都参加，加上 35% 偶尔参加的村民，可以说绝大部分村民都或多或少参加了这一仪式。在“参加村委会选举”这一问项中，有 47.5% 的村民每次都参加。但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有高达 32.5% 的村民(26 人)表示从未参加过村委的选举。在访谈中，访员对从未参加村委选举的原因进行了追问，大部分村民表示不参加的原因是“不感兴趣，不愿参加”。

表 7 参与网络得分分布表

	没有参加	偶尔参加	每次都参加	平均分
参加传统仪式	2 2.5%	28 35%	50 62.5%	1.60
参加村委选举	26 32.5%	16 20.0%	38 47.5%	1.15
参加村修路等公益事务	11 13.8%	10 12.5%	59 73.8%	1.60
参加村修宗祠等公益事务	22 27.5%	13 16.3%	45 56.%	1.19

表 8 配对样本 T 检定(Paired-Samples T-Test)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统计检定结果
参加传统仪式	1.60	0.542	(80)	t=2.631 df=79 p=0.01
参加村修宗祠等公益事务	1.29	0.874	(80)	
差异	0.313	1.062	(80)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村民对参加传统仪式和修建宗祠这两项表面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公共事务态度差异明显。按照我们预先的设想，这两个问项都是在测量村民对传统文化(仪式)的态度，两种态度之间应该没有显著差异；参加“上灯”等传统仪式越多的村民，相应地应当更积极地参加修建宗祠等村社公共事务。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对二者进行了配对样本 T 检定。从表 8 中我们发现：村民参加“上灯”、“拜祖”等传统仪式的平均分为 1.60，高于村民参加修建宗祠等集体活动的平均得分 1.29，且经过统计上的检定我们得知，两者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即我们先前假定的“参加‘上灯’等传统仪式越多的村民，相应地应当更积极地参加修建宗祠等村社公共事务”是不成立的。结合访谈，我们探究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从总体上看，村民的宗族意识越来越淡化，很多村民从未参与过修建宗祠的活动，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城市扩展而伴生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乡村人际关系和利益格局的侵蚀是相关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原有的宗族、血缘观念不断消解，作为宗族观念外化产物的宗祠必然日益受到冷落。但另一方面，代表传统文化的“上灯”、“拜祖”等仪式仍然参与者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仪式多在逢年过节时举行，恰逢农闲时节，外出务工的村民大多也返回家乡，因此，村民有比较多的机会参与这些活动。

(四) 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关联分析

最后，为了检验帕特南提出的“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产生”这一理论，我们以社会信任作为依变量，互惠规范和网络参与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我们以 Q1、Q2 结合成信任维度变数，以 Q3、Q4、Q5 结合成互惠规范维度变数，以 Q6、Q7、Q8、Q9 结合成参与网络变数(具体问项参见表 1)，各变数的内在一致性信度检定(Cronbach's α 值)结果分别是 0.630, 0.521, 0.436(表 2)。

按照帕特南的理论，信任存量与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三个变数之间应该两两相关，并且后两个变数对信任变数具有显著影响。表 9 中可以发现，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两个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并不严重

^①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 205 页。

(VIF<5),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在前文效度检定量表当中观察到的现象: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之间存在关联,但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分别与信任存量具有相关性,且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具体就P村而言,我们发现村民的互惠维度得分越高,其信任得分越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频率越高,其信任得分也越高。这一结果证明了我们的理论预设:在现代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中产生。

表9 影响农村信任度的回归分析模型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共线性(VIF)
截距	.088	.573	.879	
互惠规范	.464	.142	.002	1.003
参与网络	.779	.163	.000	1.003
样本数	80			
Adj. R ²	.276			

说明:显著性基于双尾检定。

五、综合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P村为例,探讨了社会资本的结构与测量,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经验验证。我们发现,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其中,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之间的关联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分别与信任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

就P村的社会资本状况而言,如果以100为满分,其信任、互惠和参与维度的得分都超过了60分,说明P村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良好,即大部分村民都信任他人,而且得到过他人的帮助,也愿意在他人需要帮助时给予回馈。在参与村公共事务方面,大部分村民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但当我们对P村社会资本的内在结构深入分析时,可以发现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虽然P村的信任维度总体得分较高,但村民对亲属、本村人、外村人的信任度依次递减,说明P村的社会信任主要存在于小规模、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中,是基于对当事人熟悉而产生的信任。但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大型化,其结构也越来越复杂,社会信任的建立需要更多非私人化的或间接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信任总量。

其次,在P村,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对传统文化的逐渐消解,传统功能性网络,如村民村风伦理自律会、文艺队、农业合作互助组织已不复存在。目前P村的民间组织仅存一个带有宗族色彩的“红白喜事”理事会,组织村里宗族“红白喜事”及每年九月初十的登山“祭祖”这一民间传统仪式。这说明在P村社团组织稀缺,仅有零星存在的传统民间仪式还在勉强维持着村落的“超家族”人际网络。

再次,我们发现有效问卷中有高达32.5%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加村委选举,原因主要是因为“不感兴趣”。由此可见,在P村,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并不关心村民自治,这种现象的存在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是不利的。

总之,对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了解乡村治理的状态,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的建议和对策,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基础。

■作者简介:胡涤非,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广东广州510632。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ZZ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0JYB2061);暨南大学第三期重大工程“应急管理理论与实务”基金

■责任编辑:叶娟丽